

战略与管理

Strategy and Management

晚清军事转型 失败的战略分析

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／主编

论 1952 年中共干部政策的转变 赵 亮

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民性格 张宏卿 肖文燕

20 世纪 70 年代的亚太地区国际关系 林晓光

中日关系前沿问题研讨 周永生 徐勇 汤重南 等

抗战根据地“三三制”在晋西北地区的实践 董 佳

反腐倡廉大会战——建国初期西南地区“三反”运动 周 震

民国三大政治遗产：人民主权·以党治国·政治协商 程广云

2011—2014年精选本（全六册）

战略与管理
Strategy and Management

晚清军事转型
失败的战略分析

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/ 主编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晚清军事转型失败的战略分析 /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 . -- 海口 : 海南出版社 , 2015.1

(战略与管理丛书)

ISBN 978-7-5443-5842-2

I . ①晚… II . ①中… III . ①军事史 - 研究 - 中国 -
清后期 IV . ① E29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2118 号

战略与管理：晚清军事转型失败的战略分析

主 编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

总 策 划：万 胜

责 任 编辑：王 琳

装 帧 设计：黎花莉

责 任 印 制：杨 程

印 刷 装 订：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

读 者 服 务：蔡爱霞

海 南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地 址：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 编：570216

电 话：0898-66830929

E-mail：hnbook@263.net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 版 期 间：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：17

字 数：204 千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43-5842-2

定 价：42.00 元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，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更换



海南出版社征订单

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的《战略与管理》丛书已陆续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，主要关注中国的经济、社会和政治三维共进的现代化进程，重点发表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法治、科技、安全等战略理论和各种宏观管理理论问题的文章，诚挚欢迎广大学、政、企业界有识之士投稿和订阅。

凡购买上述图书的读者，可以通过银行或邮局向我社发行部门汇款，邮费按以下方式收取：

- (1) 平邮免邮寄费；
- (2) 购书款 50 元以下，快递按 12 元收快递费；
- (3) 购书款 50 元以上，快递并免收快递费。

邮购联系方式：

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 15 号瑞普大厦 1802 室海南出版社邮购部

邮编：100015

联系人：谢菲

联系电话：010-64028812 转 626 传真：010-64828837

邮购咨询信箱：hnyougou@sina.com

银行汇款：

户名：北京琼版图书经销部

账号：230701040004215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亚运村支行北苑分理处

汇款时请务必写清书名、册数、联系地址、邮编、收书人、联系电话。

征 订 回 执

订购单位					
通讯地址					
邮编		联系人		联系电话	
书名			定价	订数	小计
战略与管理：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银行模式			48.00 元		
战略与管理：理论之殇			33.00 元		
战略与管理：制度与德性之间			38.00 元		
战略与管理：“快文化”要把我们带向哪里？			45.00 元		
战略与管理：金融改革			39.00 元		
战略与管理：全球化			43.00 元		
战略与管理：晚清军事转型失败的战略分析			42.00 元		
战略与管理：大数据			48.00 元		
			合计		

目 录

王鼎杰	晚清军事转型失败的战略分析	1
	(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战略分析师、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)	
程广云	民国三大政治遗产：人民主权·以党治国·政治协商	20
	(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、教授)	
董 佳	抗战根据地“三三制”在晋西北地区的实践	58
	(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)	
周 震	反腐倡廉大会战——建国初期西南地区“三反”运动	88
	(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生)	
赵 亮	论1952年中共干部政策的转变	108
	(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生)	
赵 亮	1952—1953年华东大区“新三反”工作述论	121
	(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生)	
张宏卿 肖文燕	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民性格	153
	(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；江西财经大学《当代财经》杂志社编辑)	

林晓光	20世纪70年代的亚太地区国际关系： 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心 (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)	168
中日关系前沿问题研讨		
徐 勇	“八一五”日本政象的观察与思考 (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)	217
胡 澎	从日本社会和国民心态看中日关系 (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)	229
周永生	东海防空识别区与中日关系 (外交学院教授)	240
白智立	现代化发展、霸权转移与中日关系 (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)	247
汤重南	“一战”后的德国与今天的日本 (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，中国日本史学会 名誉会长)	251
徐建新	日本的过去与日本的未来 (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)	259
臧运祜	台湾学界关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(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)	263

晚清军事转型失败的战略分析

王鼎杰

军事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清王朝原有军事力量的落伍，造成了近代初期中西对抗中的被动挨打局面。^[1]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，清王朝未能成功实现军事转型，反而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击败。这段历史涉及一个后发国家进行自强转型的经验教训，具有较大的战略研究价值。但是，主流研究往往将之置于近（现）代化的大背景中，作为洋务运动研究的一个附属品来对待^[2]，侧重于外因的梳理，而缺乏对军事转型本身的关注。陈旭麓先生晚年已意识到

[1] 茅海建：《天朝的崩溃——鸦片战争再研究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97。茅海建：《近代的尺度：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》，上海：上海三联书店，1998。

[2] 蒋廷黻：《中国近代史纲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6。范文澜：《范文澜全集》第九卷《中国近代史》上册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。牟安世：《洋务运动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6。樊百川：《清季的洋务新政》第二卷《洋务新政的半殖民地军事设施》，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3。徐中约著，计秋枫、朱庆葆译：《中国近代史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学出版社，2001。郭廷以：《近代中国史纲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79。陈旭麓主编：《中国近代史》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88。陈旭麓：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2。沈渭滨：《历史进化中的兵气》，收入沈渭滨：《困厄中的近代化》，143—178页，上海：上海远东出版社，2001。袁伟时：《帝国落日：晚清大变局》，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3。[美]吉尔伯特·罗兹曼主编的《中国的现代化》（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3）仅列出国际环境、政治结构、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、社会整合、知识与教育等五个部类，而没有设置军事现代化的专章。

这一缺陷：“军事史，我们搞历史的当然可以搞，但毕竟是哲学家才能谈到哲学的本质上去，经济学家才能写出经济的内在规律。……过去对军事史的认识，实际上是用一句话来指导，即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’。我们过去写战争史，实际上也是写的政治史，缺乏军事内在的东西。”^[1]

从军事专业角度研究晚清军事转型的学术成果，并非没有。只是这些研究多偏重于技术性问题的解决^[2]，往往局限在某一具体部队、军种之内^[3]，或将之作为某一具体战争研究的附属品^[4]，而未能做出战略层面的剖析。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下卷第四章题为“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”，较为完备地再现了晚清军事转型的具体进程，并与日本作了一个粗略的对比，但依然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作空间与时间的展开，而未进入战略分析的维度。^[5]本文尝试从战略研究的角度，对晚清军

[1] 陈旭麓：《军事与近代化》，收入《陈旭麓文集》第二卷，148、149页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7。

[2] 王尔敏：《清季兵工业的兴起》，台湾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刊行，1978。施渡桥：《晚清军事变革研究》，北京：军事科学出版社，2003。王建华：《半世雄图——晚清军事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》，南京：东南大学出版社，2004。皮明勇：《中国近代军事改革》，北京：解放军出版社，2008。[美] T. L. 康念德著，杨天宏、陈力等译：《李鸿章与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2。乔伟、李喜所、刘晓琴合著：《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1。

[3] 马幼垣：《靖海澄疆：中国近代海军史事考论》，台湾：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2009。王家俭：《李鸿章与北洋舰队：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8。姜鸣：《龙旗飘扬的舰队——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2。王尔敏：《淮军志》，台湾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刊行，1981。樊百川：《淮军史》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4。

[4] 茅海建：《天朝的崩溃——鸦片战争再研究》、《近代的尺度：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》。黄振南：《中法战争诸役考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8。廖宗麟：《中法战争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2。黄振南：《中法战争管窥》，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5。戚其章：《甲午战争史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。孙克复、关捷：《甲午中日陆战史》，哈尔滨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4。

[5] [美] 费正清、刘广京编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：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下卷，198—270页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6。

事转型的败因及其影响进行探讨。

晚清战略困局的形成

在农业文明时代，能量主要来自人力与畜力，而人力与畜力的繁衍都依赖于土地，故而土地空间的大小直接决定国家的强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陆权文明就成了这一时期的主宰性文明形态。传统中国、波斯帝国、亚历山大帝国、罗马帝国、诸伊斯兰帝国，在本质上都属于陆权大国。

但是，地球的大部分空间恰恰为水体所覆盖。由于受到技术能力的局限，海洋在人类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的是阻碍作用，而非便捷的交通媒介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传统中国的地缘形势是非常优越的。中原帝国控制了华北平原就可得到雄厚的物力与人力资源，同时再控制一些产马区，就可以编练强大的骑兵，然后依托长城防线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而东南沿海则是远离战争一线的腹地纵深，长期以来享受着水体阻隔带来的高度安全保障。在来自内陆的游牧民族构成唯一致命威胁的情况下，传统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中心最终转移至南方地区，绝非偶然。

但是，地理大发现改写了历史的进程。它不仅揭开了长期笼罩在各大文明间的幕布，而且以海洋为媒介开辟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网络。结果就是，谁能控制海洋，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；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，谁就能得到最多的财富。有了财富，再培养国力，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、由富而强的强国之路。在这条道路上，葡萄牙、西班牙得风气之先，荷兰崛起于后，而最终长期掌握全球霸权的国家则是英国。

从地缘战略上看，葡萄牙、西班牙与荷兰有一个共同的缺陷，即都是大陆国家，既要兼顾陆上威胁，又要同时进行海上扩张，形成“搏二兔，不得一兔”的局面。但是，英国却是一个岛国，海洋不仅能够给它提供财富，更能给它带来安全。只要它能控制海洋，就同时得到了利益与安全。随着控制水域范围的扩大，它的财富与安全值也就不不断增加。所以，大英帝国才得以运用其均势战略维持住欧陆列强间的平衡，自己则进行全球商贸—殖民扩张，走的是一条由海向陆、富强兼备的大国崛起之路。^[1]

具体到军事领域，由于这一时期的陆地作战依然依赖人力与畜力，所以难以实现重型火炮与兵力的远距离快速机动。但海军因为借助了风力与水体的浮力，却可以实现火力与兵力的快速机动，“并在敌人陆基部队抵达滩头阵地之前，让部队在对方的海岸登陆”。^[2]结果，海岸线漫长的传统陆权国家很难有效应对海权国家的威胁。而那些疆域局限在内陆的国家虽然有幸避免了海权国家的直接威胁，但由于被摒弃于全球市场竞争的大棋局之外，反而陷入更加虚弱的状态。

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遭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通过传统的驿递系统掌握军情的清王朝，总是只能得到早已过期的战报。而送往前线的指示也同样还没抵达前线就已失去了价值。就算有了准确的情报，依靠徒步与骡马机动的清军也很难对英军采取有效的反制。于是，总体上占据绝对兵力优势的清军，在局部战役中反而处于兵力劣势，处处被动挨打。^[3]

[1] 参阅拙著《当天朝遭遇帝国》，第一章“海权风潮五百年”，1—18页，重庆：重庆大学出版社，2010。

[2] [美] 约翰·米尔斯海默著，王义桅、唐小松译：《大国政治的悲剧》，150页，上海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，2003。

[3] 参阅《当天朝遭遇帝国》。

道光皇帝在战争期间已认识到这一窘境：“英夷如海中鲸鳄，去来无定，在我者七省戒严，加以隔洋郡县，俱当有备，而终不能我武维扬，扫穴犁庭。试问内地之兵民，国家之财赋，有此消耗之理乎？”^[1]

后来郭嵩焘亦指出：“或竟受惩创，扬帆以去，各省海口不能撤防，一年二年，又必复至，或遂恣意横行，为祸且将欲烈。……中国沿海八九千里，果何以堪之？”^[2]

更糟糕者还在于，昔日的安全腹地转而成为战略前沿的同时，伴随着俄罗斯的东扩，传统的陆权威胁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加严重了。而在海洋方向上，新崛起的日本更是急于颠覆远东格局，取中国而代之。^[3]结果就是，在列强环伺的时代，大清国和陆权强国之间缺乏海峡的屏蔽，与海权强国之间则缺乏陆地的阻隔，而两方面的国防压力又同样急迫，最终陷入一种两线作战、缺乏战略后方的窘境之中，传统的地缘优势转而成为一个空前的战略困局。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双重威胁，就成了清王朝军事变革的核心命题。

欧洲军事变革与破局机遇

实际上，清王朝军事转型的机遇早已出现。这就是 19 世纪欧洲的军事变革。19 世纪的欧洲军事变革是多个层面、多个波次的持续变革。

[1]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鸦片战争》第二册，63 页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、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0。

[2] 郭嵩焘撰，陆玉林选注：《使西纪程——郭嵩焘集》，98 页，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4。

[3] 关于幕末到明治时代日本的扩张方略演变，参阅 [日]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：《戦史叢書·大本營陸軍部（1）》，朝云新闻社，1967。[日] 吉冈吉典：《日本の侵略と膨張》，新日本出版社，1996。[日] 森松俊夫：《日军大本营》，北京：军事科学出版社，1985。[日] 井上清：《日本军国主义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5。[日] 升味准之辅：《日本政治史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7。王芸生辑：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，大公报出版部，1932。

其中下述几项变革，对清王朝而言具有不容低估的战略性意义。

1、蒸汽时代的到来

19世纪的蒸汽机革命，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剧烈的一次驱动力革命，导致了煤炭资源地位的提升，而中国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，故而只需内部开发就可得到充足的动力源。待到内燃机革命后，石油时代来临，中国便不再享有这一自足性优势。

2、蒸汽动力的陆权化

铁路的出现导致了19世纪的交通革命，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开发与战争形态。正如迈克尔·霍华德所说的那样：“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。同样重要的是，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。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；如今，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，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。其次，军队到达战场时，精力充沛，状态良好；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，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，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。第三，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：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，并补充上新的力量；如果战役延长，军队可以调换。”^[1]

铁路使部队可以实现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进军速度，同时期通信领域的电报革命，则使得指挥中枢可以及时掌握前方的战局变化，从而使战争的时空概念完全改写。^[2]结果就是：（1）战争趋于扩大化和持久化，从而有利于陆权大国及人口大国。（2）因为铁路只能修筑在

[1] [英]迈克尔·霍华德著，褚律元译：《欧洲历史上的战争》，103页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8。

[2] [美]彼得·帕雷特主编，时殷弘等译：《现代战略的缔造者：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》，274页，北京：世界知识出版社，2006。

陆地上，从而使得海权国家在这一新技术变革中的得利远逊于陆权大国。

3、工业化总体战的趋势愈演愈烈

从拿破仑战争到美国南北战争，工业化总体战的趋势愈演愈烈。结果，像英国这样的传统海权国家日渐难以制衡住欧陆上的新兴强国，而德、俄、美这些陆地大国则逐渐占据综合竞争优势。^[1]

4、参谋总部制度的产生与现代战争指导模式的形成

农业文明时代的战争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，有下述两个特点：（1）战场空间有限。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，最高统帅依然可以直接控制会战进程，并亲临现场，以目力观察和口述命令影响会战进程。（2）重视指挥官的勇气和经验，轻视其知识和学习。以威震欧洲的普鲁士军队为例，直到拿破仑战争时，其军官团仍以庄园贵族子弟为主，而且这些军官几乎完全不学习数学，也不接触最新的军事地图测绘工作。“一位将军只要勉强写出其姓名，就不算是没有受过教育；好一点的话，则可能自夸为学者、墨客及三流作家。”^[2]

但是，19世纪的军事变革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概念，形成了全新的战争指导模式：“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，作战指挥已全部由经过技术、科学训练的杰出专业人才担任。……战争已从王公贵族的赌博，逐渐

[1] 参阅〔德〕鲁登道夫著，戴耀先译：《总体战》，北京：解放军出版社，2005。〔英〕富勒著，钮先钟译：《战争指导》，呼和浩特：内蒙古文化出版社，1997。〔英〕富勒著，钮先钟译，《西洋世界军事史》卷二、卷三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4。〔美〕T.N.杜普伊著，严瑞池、李志兴等译：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》，北京：军事科学出版社，1985。〔美〕麦尼尔著，倪大昕、杨润殷译：《竞逐富强——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》，北京：学林出版社，1996。〔美〕杰弗里·帕克主编：《剑桥战争史》，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1。还有前引的《欧洲历史上的战争》。

[2] 傅宝真：《德国军事史：1640—1918》，22页，台湾：“国防部”史政编译室，2005。

演变成由一个技术化的、隐姓埋名的机构来领导的斗争。”^[1]

在这一点上，得风气之先者是普鲁士陆军中的改革派。在沙恩霍斯特、格纳泽瑙与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带领下，普军进行了大胆的革命性尝试，构建了全新的参谋总部制度，并最终为老毛奇所完善。^[2]这一新制度同时具备了下述四种特性：^[3]

首先，参谋本部是一个研究机构。它直接管理陆军大学，并以战史编纂为头号任务。它将军界精英聚集起来，广泛搜集本国和各军事强国的兵要地志和各种军事情报，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军事问题的深入研究。其中，对军事史的研究被规定为参谋本部的核心职责之一。战争失败与失误研究，尤其是对自身的失败和失误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视。

其次，它又是一个教育机构。它将前述研究成果转化为操典和教材，通过军校和军队，切实地贯彻到基层。同时，它不仅从基层遴选精英，还周期性地将总部的精英派到基层，交流互动，避免军人成为学究。它还通过外派武官制度，使得军界精英得以到国外尤其是假想敌国进行长期的体验和观察，既收集相关信息（尤其注重军事地理的实地勘测与数据采集），又做到从思维方式到文化心理的知己知彼。

再次，它又是一个决策机构，负责提前选定假想敌，并依赖于前述信息采集，提前制订精密化的战争计划。

最后，它还是战时事实上的最高指挥机构。其最终目的在于形成

[1] [德] 瓦尔特·戈利茨著，戴耀先译：《德军总参谋部：1650—1945年》，14—15页，海口：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，2004。

[2] 《德国军事史：1640—1918》，39—147页。《德军总参谋部：1650—1945年》，17—92页。《现代战略的缔造者：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》，282—310页。

[3] 参阅《德国军事史：1640—1918》，《德军总参谋部：1650—1945年》。[日] 大江志乃夫：《日本の参謀本部》，中央公论社，昭和六十年。[日] 大桥武夫：《参謀総長モルトケ》，マネジメント社，昭和五十九年。[美] 保罗·肯尼迪著，陈景彪等译：《大国的兴衰：1500—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》，179—180页，北京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2006。

一个学习型、研究型的专业化军官团，并进而通过参谋体系对战争进行精密化的准备、指导与协调。德意志统一战争的胜利，在军事层面，即是参谋总部制度和战略性铁路网结合的胜利。^[1]

综上所述，不难发现，前三项变革共同预示了陆地大国的复兴机遇。而参谋总部制度则超越了海权与陆权，构成所有国家军事现代化的制度基础。德意志的统一，后来苏俄的崛起，均是把握住这一时代机遇的结果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，清王朝有几十年的时间利用这次难得的军事变革机遇。而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也出现了有利于其军事转型的变化：西洋列强之间暂时形成了势力均衡状态。欧洲出现了法德对抗，在欧洲之外则有英俄对抗。美国暂时无力亦无意破坏远东均势。^[2] 这五国均无意与中国陷入大规模战争状态，最急迫的威胁仅有日本。如此难得的战略良机，当时的清王朝内部已有人见其先机。

晚清改革派的战略认知

早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，李鸿章已率先意识到西洋武器的威力，但却认为：“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，平中国有余，敌外国亦无不

[1] 《西洋世界军事史》卷三，92—94页、116页。《參謀總長モルトヶ》，21—175页。《现代战略的缔造者：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》，282—310页。《德军总参谋部：1650—1945年》，63—93页。[加] 肯尼斯·M. 奈斯比特：《转变中的战略和技术：莫尔特克和普鲁士总参谋部》，收入[加] 阿兰·D. 英格利施等著，王彦军、戴艳丽、白介民等译：《变化中的战争》，36—59页，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1。[美] 阿彻·琼斯著，刘克俭、刘卫国译校：《西方战争艺术》，292—305页，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01。

[2] [美] 基辛格著，顾淑馨、林添贵译：《大外交》，70—159页，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2001。

足。”^[1] “中国但有开花大炮、轮船两样，西人即可敛手。”^[2] 此后，李鸿章逐步认识到西洋武备绝非仅此二者，更意识到军事转型不等于武备转型。

1874年的海防大筹议中，李鸿章已清晰地表述了对当时中国地缘困局的忧虑：“历代备边，多在西北。其强弱之势，客主之形，皆适相埒，且犹有中外界限。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，各国通商传教，往来自如，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。阳托和好之名，阴怀吞噬之计，一国生事，诸国构煽，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。”^[3]

李鸿章认识到了西洋列强的先进：“轮船电报之速，瞬息千里；军器机事之精，工力百倍。炮弹所到，无坚不摧。水陆关隘，不足限制。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。”^[4]

他对日本的威胁亦有清晰认识：“泰西虽强，尚在七万里以外。日本则近在户闼，伺我虚实，诚为中国永远大患。今虽勉强就范，而其深心积虑，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，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，将来稍予闲隙，恐仍狡焉思逞。”^[5]

而变革的契机，即在电报、铁路的引进。如郭嵩焘所论：“泰西遍国皆机器也，中国无能效之；其必宜效者二：一曰电报，一曰汽轮车。盖中国幅员万里，驿路远者经月乃达，骤有水旱之灾、盗贼窃发之事，利病缓急在须臾之间，而所以应之，常在数月之后。有电报则信息通，有汽轮车则转运速，可以处堂户而坐制万里之外。是二者之宜行也，

[1] 《李鸿章全集》第五册，2418页，北京：海南出版社，1997。

[2] 同上书，2419页。关于轮船与西式火炮对太平天国东征苏南战役的影响，参阅林伯格、陶德合著，台湾“国防部”史政编译室译：《近岸、近海及远洋舰队：自1861年迄今地理环境对海军作战之影响》，314—320页，台湾：“国防部”史政编译室印，2005。

[3] 《李鸿章全集》第二册，825页。

[4] 《李鸿章全集》第二册，825页。

[5] 《李鸿章全集》第二册，833页。

无待再计决也。”^[1]

1879年冬，李鸿章的重要幕僚马建忠也指出，铁路有救患、节用、开源三大利。论及开源之利时，他已谈到煤铁复合体型经济及其与铁路的关系：“英人所以致富，曰煤与铁，遍西南洋而尽用之。今我中国豫晋之产，西人谓其尚富于英，乃未闻豫晋之煤铁行至千里，岂复望其行于外洋以夺英人之利乎！”^[2]

马建忠更明白地指出，铁路建设是国防的迫切需要：“且思轮船梭织海上，西洋各国运兵而至者无逾四旬日。即俄国由博罗的海而达中国，亦无逾五旬日。而吾自腹省调兵滇南，或自关内调兵塞外，能如是之神速乎？以轮船之缓于轮车，而人在数万里外反居我先，矧异日各国之以轮车环集我乎！且中国数万里之疆域，焉能处处防御，所贵一省之行军可供数省之用，一省之饷可济数省之师，首尾相接，遐迩相援。为边圉泯觊觎，为国家设保障，惟铁道为能，此诉以当行而不容稍缓者也。”^[3]

李鸿章本人的观点亦与之相近：“用兵之道，必以神速为贵。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，水路则有快轮船，陆路则有火轮车，以此用兵，飞行绝迹。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，则又有电报之法。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，战则以兵戎相见。海国如户庭焉。”^[4]

1879年冬，因中俄边境危机，发生了俄国铁甲舰来华示威的事情。1880年，清廷特召淮军宿将刘铭传入京陛见。在李鸿章的授意下，刘铭传趁机提出了修筑战略性铁路干线的建议。他从日、俄的地缘威胁

[1] 郭嵩焘：《铁路后议》，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洋务运动》第六册，316页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0。

[2] 冯桂芬、马建忠撰，郑大华点校：《采西学议——冯桂芬、马建忠集》，141页，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4。

[3] 冯桂芬、马建忠撰，郑大华点校：《采西学议——冯桂芬、马建忠集》，142页。

[4] 《李鸿章全集》第三册，1185页。